

# 看不见的女性

## ——小说《新奥德赛》中“属下”身份的解读

章莉嘉

广东白云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50

**摘要：**非虚构文学《新奥德赛》由帕特里克·金斯利执笔，这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兼《纽约时报》国际通讯员生动记录了欧洲自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危机。2015年间，金斯利踏遍移民路线沿线的17个国家，采访了他们穿越沙漠、海洋与山川，为抵达欧洲史诗般的新世纪“奥德赛”之旅。全书以哈希姆的故事作为叙事起点展开，作为沉默的存在，文中哈希姆之妻哈雅姆的笔墨并不多，却隐喻了其边缘群体与底层女性双重身份下无法发声的苦难。本文将立足盖雅特里·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尝试深入剖析哈雅姆身上根深蒂固的“属下”特征，以及个体或群体在统治阶级霸权与传统父权意识形态双重压迫下内在的困境。

**关键词：**属下；斯皮瓦克；《新奥德赛》；女性主义

### 一、斯皮瓦克与“属下”理论

作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杰出代表，斯皮瓦克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引入“属下”概念及其衍生的后殖民理论体系，这使她成为挑战并解构西方学术界既有认知秩序的思想家。自1980年代起，斯皮瓦克发表系列文章与著作，反思欧美女性主义的学术立场，倡导性别的语境化研究，并通过考量边缘化女性在种族与性别、阶级与性别、权力与性别、殖民活动与性别等多维度中的特殊经历，重新审视欧美女性作家的作品<sup>[1]</sup>。

斯皮瓦克强调边缘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女性群体中存在西方女性与欠发达地区女性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女性群体中存在城市女性与乡村女性的差异，城市女性群体中又存在所谓上层阶级女性、中产阶级女性和下层阶级女性的差异。她们面临的问题、利益诉求及表达方式存在显著差异<sup>[2]</sup>。而白人欧洲裔美国女性主义未能审视特定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受压迫女性的生存经验，也未能代表并发声诉诸其他族裔女性的历史与利益诉求<sup>[3]</sup>。

### 二、《新奥德赛》：“属下”的内涵解读

“属下”一词最初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西多提出，后经印度庶民研究小组和斯皮瓦克拓展，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延伸至因种族、阶级、宗教信仰等因素遭受主流文化压迫歧视、生活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sup>[4]</sup>。

作为属下研究群体核心成员，斯皮瓦克在其最具争议的代表作《属下能说话吗？》中指出：属下群体“有

别于精英阶层”，实为帝国主义为强化殖民统治与巩固意识形态而刻意塑造的“他者”形象<sup>[5]</sup>。他者永远存在于确立主体话语权的优越性中，作为属下的他者既无历史也无个体差异，永远处于沉默状态<sup>[4]</sup>。斯皮瓦克在研究“属下他者”时，将其内涵拓展至后殖民语境中那些丧失主体性、无法为自己发声的群体<sup>[5]</sup>。

而在《新奥德赛》中，这种特征尤为鲜明——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哈希姆身上，更体现在其妻子哈雅姆这一女性形象中。

首先从种族层面看，作为叙利亚人，他深受动荡暴政之苦，饱尝战争与流离失所的煎熬，既无话语权，亦无身份认同，更无发声渠道。抗议与起义爆发之际，他只能带着全家——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辗转流亡。无论在故土叙利亚、埃及还是瑞典，他始终无法获得基本生存空间，既无归属感，又长期困于不确定性与歧视之中。因此在所有层面，他都是彻头彻尾的“属下”。

其次，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斯皮瓦克“属下”概念的独特性在于其“无言性”——即缺乏主体性意识，这使得为属下群体建构主体性意识成为当务之急。事实上，“属下”概念初现时便带有“无法言说”的初始特征，主要指代欠发达地区中未组织化的农村群体，这类群体在整体上缺乏社会政治意识，因而易受主流思想、文化及政府领导的支配<sup>[6]</sup>。且正因为这种统一的集体性缺失，《新奥德赛》中无论来自非洲或中东的——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厄立特里亚人、巴勒斯坦人、苏丹人和索马里人——皆难以聚合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发声，他们由于

文化上的顺从丧失了主体意识<sup>[6]</sup>。因此哈希姆及其妻子哈雅姆都极易被西方世界文化意识形态左右，无法信赖自我来时身份，亦无法判断在汹涌时代浪潮中该逃向何方，归于何处。

最后最为重要的一点，从性别视角看，作为中东女性且附属于丈夫的哈雅姆，其话语权更是被压缩到极限。她同时承受着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帝国主义以及白人欧美女权主义的双重压迫。在迁徙流亡的艰辛旅程中，她痛失两位兄弟（她的两个兄弟在一天内被同一位狙击手打死了，第二个兄弟是在给第一个兄弟收尸的时候被射杀的），变卖首饰，失业无依，与丈夫分离，屡遭排斥、歧视与羞辱，甚至时常面临生命威胁。尽管承受的苦难以然沉重，但作为“绝对他者”与“属下”的“属下”<sup>[4]</sup>，她既无发声渠道，更注定被外部世界抹去存在。

### 三、“看不见的女性”：“属下”的性别解读

《新奥德赛》的独特与可贵在于，它完完全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了一场新世纪的流浪之旅：一个名叫哈希姆·苏基的叙利亚人的故事。文中每隔一章便聚焦哈希姆寻求安全的历程，作者极具个人色彩的叙事与更广阔的危机叙事交织呈现，让读者得以在个体旅程与穿越大陆的集体命运间往复穿梭。而为何选择哈希姆？他既非自由斗士亦非超级英雄，只是个普通叙利亚人。正因如此，作者讲述他的故事也映射着每个普通人的故事，我们任何人都可能踏上他的旅程。

而作品的薄弱与惋惜之处则在于极度缺乏女性移民的故事和女性身份的视角，即我们无从得知另一半人的故事，这本应是每个人的故事，由她们自己讲述的故事。

贯穿整个叙事，作者始终采用丈夫哈希姆的视角，哈雅姆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其形象只得通过他人之口片面扁平呈现。底层民众的命运往往是上层阶级意志与社会环境的结合体<sup>[7]</sup>。随着文中时间线的发展，“属下”哈雅姆的命运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转折颠覆。

当哈希姆的护照申请意外获批时，他们视此为难以解释的幸运时刻。但随后哈希姆与哈雅姆发现现实远非如此简单。受困于拮据的经济状况，哈雅姆不得不变卖所有珠宝。后来他们更发现埃及并非难民的天堂，而是另一处苦难之地。这是她梦想首次支离破碎。身为“属下”，她毫无经济地位，哈雅姆不得不承受政权更迭带来的沉重代价。

而当他们终于抵达埃及时，生活突然给了他们当

头一棒。哈雅姆找不到教师工作。他们怀念从前的幸福生活，但那不过是又一个虚幻的白日梦。没有工作，哈雅姆既无经济来源也失去社会身份，这正是哈雅姆“属下”身份的又一体现。

当哈雅姆前往当地政府部门办理手续时，官员对这位叙利亚女性流露出厌恶之情。她小心翼翼靠近办公桌时，对方厉声喝道：“站在那边说话！”这一场景或许最为直接地凸显了哈雅姆因身份遭受的歧视。由于种族身份——尤其是作为欠发达地区女性——在欧美社会范式下，哈雅姆被视为“他者”，承受着种种歧视与偏见，这也体现了哈雅姆形象的“属下”特征。

当哈希姆最终抵达瑞典时，哈雅姆带着孩子们回到了陌生的埃及，举目无亲。更糟的是，他们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因资金危机，联合国已削减了他们的食品券。尽管她找到阿拉伯语教师工作，但月薪仅400埃及镑。这笔收入略高于30英镑，还不足支付房租的一半，靠着积蓄和朋友捐助勉强维持生计，但连基本伙食费都捉襟见肘。她唯一的简单愿望——像穆斯林世界其他人那样准备开斋节盛宴都无力承担。此处首次展现哈雅姆强烈的情感波动——“泣不成声”地致电友人。她每日为温饱挣扎，深陷贫困的阴暗深渊，完全沦为弱势群体，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在小说尾声：当哈希姆为移民资格奔波于各类面试时，哈雅姆独自在埃及的悬置状态中生存，宛如社会弃儿。在这个性骚扰泛滥、充满强权与歧视的父权社会里，哈雅姆难以正常生活。既不能在孩子面前显露脆弱，也不能让哈希姆察觉她的孤独，她深知丈夫的生活已足够艰难。此时所有因素在哈雅姆身上交织显现——种族、经济、社会身份与性别身份。

以上便是为数不多可以找到有关哈雅姆的笔墨描写，尽管作者做出过这样的解释——“这次奇怪的遭遇在难民群里引起了一丝不安，这似乎是在提醒他们，他们随时可能遇到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并不一定友好。由于这个原因，一路上我很难取得难民们的信任。他们怎会知道我不会歪曲地报道他们的事情呢？他们又怎么能够确定我是记者呢？我用阿拉伯语跟他们交谈，这有助于跟他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但一些人还是不愿冒险与我谈话。妇女往往比男人们更小心一些，这就是我的书里很少有描写女士的逃难经历的原因”，这本无可厚非，群体中某一个特定女性的描写确实不是叙事重点，作者只是通过这一情节暂时让渡女性议题的探讨空间。

但是小说缺乏对这一问题多维度的审视与反思，主体“属民”——男性角色的立体塑造是通过通过对女性的剥削与刻意忽视达成的，比如文中默认妻子哈雅姆的自我牺牲，认为这种托举是母亲该做的，没有看到任何家庭成员对她付出的具体互动、反馈和关怀。小说中女性女性身份的视角缺失，在于没有提供足够的情节和情感细节，无论哈雅姆还是其他女性形象，都更像是作为景观意义存在的不容置疑的背景板，而不是可供探讨的人生选择——而这一点在主角哈希姆的挣扎上却体现颇深。这就使得任何试图深入探讨的声音都因为它粗暴地母职设定而显得过度解读或偏离主题意义。

更为吊诡的是，即使是着眼于女性痛苦经历的描写，却强调着男性的道德煎熬与挣扎——“妇女们则说，她们经常遭到强奸。由于无聊，那些荷枪实弹的蛇头经常会找妇女来取乐，有时候还会拉上几个男性移民，令其观看蛇头们如何对待这些人的女同胞。‘他们想让我们看着他们强奸那些女人，’一个至今想起这事就会痛恨自己的厄立特里亚人如此说，‘你会痛恨你自己，恨自己是一个人。’”

然而，容纳不了多方视角讨论的文学作品，自然是单薄而脆弱的。以配角为工具来衬托主角成长固然是叙事策略的一种，但越来越多底层女性“属民”在类似的叙事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几乎由男性角色构成的文本中，一个明确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势必会挑

起女性视角的关注与质询。女性角色或女性议题只能在后殖民或女性主义作品文本范围内讨论吗，若放在更为普遍的题材中就会被指责为失焦偏题，将这种讨论紧紧限制在女性主义作品中反而会强化性别的隔离与壁垒，女性议题不是专属或特殊话题，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我们无论借由“属下”或其他角度进行解读，都是希望它能够平等地融入主流叙述，更何况《新奥德赛》是一部极具同理心的难民题材文本，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

《新奥德赛》中的哈雅姆是典型的“属下”群体形象，其属下身份根植于社会环境。时局政权动荡、欧洲移民危机、种族性别与民族压迫，使身处社会底层的哈雅姆遭受多重压迫，从而成功塑造了她的属下身份，成为主流社会歧视压迫的边缘人物。她默默承受着种种歧视与偏见，为求生存不断试图建构新的女性身份，抵抗各种霸权，在苦难艰辛中仍葆有一丝勇敢、顽强、坚韧。

斯皮瓦克的属下理论主要揭示了个人或群体在统治阶级霸权与传统父权意识形态双重压迫下的内在困境。她关注的是如何将处于弱势的非欧美主流文化文本翻译到西方世界，使这类文学文本能够在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干扰和文化霸权的影响下，真实地呈现这一群体，表达其真实的自我，从而突破民族国家和性别框架的叙事<sup>[8]</sup>。

#### 参考文献：

- [1] 刘岩.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视域：以斯皮瓦克的语境化性别理论为例 [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9, (01): 293-302.
- [2] 陈义华. 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臣属者”视角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01): 21-27.
- [3] 陈义华, 林培源. 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理论建构策略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35(01): 175-180.
- [4] 郭夏迪. 女性的压迫与反抗：《毁灭》中黑人女性的属下地位解读 [J]. 品位经典, 2020, (07): 3-4.

- [5] 张弛, 陈卫燕. 无声的人：运用属下理论解析《孤独的人》 [J]. 英语广场, 2019, (10): 3-5.
- [6] 陈义华. 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臣属者”视角 [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01): 21-27.
- [7] 刘小姣, 许庆红. “属下”的形象演变——斯皮瓦克帝国主义批判理论下的女性文本解读 [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20(04): 43-47.
- [8] 李明喜. 斯皮瓦克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04): 58-62+190.